



现代汉诗怎样 走出自身面对的危机

□ 泓 峻

对汉语诗歌而言,从以《诗经》为发端,以格律诗为典型形态的古典诗词,到“节无定句、句无定顿、可押韵可不押韵”的白话“自由诗”的转变,确实是一场划时代的文学革命。到今天为止,尽管刚满百岁的白话新诗在汉语诗歌发展史上,还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我们已经无法想象现代汉语诗歌的主流形式再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古典”形态。汉语新诗的方向之所以不可逆,是因为在过去的100年里,现代白话作为汉语的书面语,已经彻底战胜了长期占据汉语书面语中心位置的文言。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所指的“语言”,应该是在作家生活的时代里人际交往中(书面的或口头的)被广泛使用的“活着”的语言。在汉语文言的书面交际功能被现代白话取代之后,把现代白话作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写作的主体语言,是现代文学必然的选择。在今天,面对少数人对白话新诗替代古典诗词合法性的质疑,如果要论证现代汉诗绝对不应该走复古之路的话,“现代文学必须把现代汉语作为自己的主体语言”,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论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汉诗可以与中国2000多年的诗歌传统一刀两断。相反,汉语新诗要想健康发展,还必须时时回顾这一传统,并不断从中吸收营养,找寻灵感,汲取经验,因为这个传统堪称博大精深,可以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

实际上,当我们强调“现代文学必须把现代汉语作为自己的主体语言”时,不得不面对的历史:100年前,创造了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体——现代白话文,并帮助它打败文言文的主力军,正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在起步的时候,没有一套成熟的现代汉语供它使用,它与现代白话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在以“国语的文学创造文学的国语”的过程中,现代白话诗歌更是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在与文言文进行白刃战的过程中,新诗采取的战术,则是最大限度地与古典汉语诗歌划清界线。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胡适当年的“八不主义”宣言就十分清楚了。应该说,为了打倒占据汉语书面语核心地位1000多年的文言,尽快确立现代白话

的正统地位,白话诗歌采取激进的反传统姿态是必要的,事后证明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白话诗歌的“诗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用当时批评白话诗歌的人的话讲,就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

如果站在审美立场上看的话,我们发现,被胡适等人批得体无完肤的古代文言,实际上是一种十分优雅与唯美的语言,其简洁、含蓄的表现方式,其对音律与节奏、语气与文势的执着追求,其独特的用典、用事、对偶、比兴等修辞手法,不仅不与文学相隔膜,甚至特别适合于文学。中国古典诗词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正是因为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这套语言在营造诗性方面的潜力。

但是,进入近代以后,这样一套充满诗性的语言,却越来越不适应进步知识分子用来输入新科学、新观念,进行大众启蒙与社会改良的需要。因此,它的悲剧性命运也是注定了的。到了五四前后,为了一个比文学更重要的、更高的目的,书面语言必须尽量地向口语靠拢,只适合于文学表达而不利于接纳新知识、新观念,不利于大众启蒙的古代文言必然要被放弃,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中达成了共识。他们同时还认为,新的语言不能靠语言学家创造,而是必须借助于文学家之手,这就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发生的真实语境。

然而,文学毕竟是一门艺术,当白话与文言的较量有了结果之后,以“胡适体”为代表的新诗在艺术上的缺陷很快受到广泛的诟病。而新生的白话诗歌要想在语言上走向成熟,使自己整体的艺术水平与汉语诗歌传统匹配,则需要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建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实际上是白话汉语诗歌摆脱初期的幼稚、直白、粗陋,追求从容、蕴藉、细腻时曾经倚重的资源。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汉语诗歌深厚的艺术传统,支撑着白话新诗走出了最初的危机,在完成了其语言学使命之后,在艺术上也很快站稳了脚跟。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再去争论现代白话诗歌究竟像不像诗的问题。即使到了今天,当我们试图反思五四新文学过于激进的文化立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正价值时,认为汉语诗歌应当抛

弃白话诗歌这一形式,重返古典诗词文本形态的人,也是极少数。

然而,当下的新诗仍然充满危机。人们发现,汉语新诗的创作与欣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成为极少数人十分专业化的行为,无论是诗歌的形式,还是表达的内容,都离人们(甚至包括诗歌作者自己)日常的情感与思想状态越来越远。许多写“白话诗歌”的人,却整天端着一副诗人的架子,挖空心思地寻找惊世骇俗的思想情感与表达方式。这种状态,恐怕是当初攻击旧体诗词并提倡“新诗”创作的胡适等人完全始料未及的。

新诗的这种状态,不但与当年发动文学革命的先辈们的“初心”相去甚远,而且也与汉语诗歌自身的固有传统格格不入。在白话新诗占据汉语诗歌主流之后,个人的旧体诗词写作实践一直没有中断过。我们发现,与新诗的写作状态相比,被当年胡适等人斥为脱离现实、空洞无物的旧体诗词的写作,似乎更能够将诗人的创作活动与其日常经验很好地融为一体。对于不少写旧体诗词的人而言,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发现、感动、感悟,似乎都可以迅速转化为诗作。他们将旧体诗词的写作完全当成了思想情感表达的自然而然的需要,根本不在乎是否有诗人的名分与诗人的气派。

旧体诗词写作的这种“业余”状态,许多自嘲为专业作家的新诗作者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在几千年的汉语文学史上,这恰恰是一种常态。包括屈原、陶潜、杜甫、苏轼等流芳千古的大诗人在内,许许多多的古代作者,都不是以诗人作为职业的,他们的诗作,实际上就是他们从政、治家、社会交际、个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事件、所产生的思想以及所体验的情感之真实记录,诗对他们因此是一种日常言志抒情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不是刻意的“创作”。唯其如此,在很长时间内,中国才是一个诗人层出不穷、诗歌层出不穷、诗歌读者层出不穷的“诗的国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使诗歌写作回归日常生活,正是回到了汉语诗歌的传统之中。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自然而然的吟唱,其实是汉语诗歌的真谛所在,也是其真正感人的艺术魅力所在。这种诗歌传统,对于校正当今汉语新诗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它走出面临的困境,应该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叙事学在西方文论中无疑具有现代背景,尤其适用于当时新的文学现象,当然西方叙事学也用来研究现代派之前的许多经典作品,解构了许多固定的解读模式,而生成新的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路径。在中国,叙事学的引进和运用,往往集中实践于1985年前后出现的新潮小说。少数学者曾部分借助叙事学方法来对古典文学和现代时期的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理论上基本是移植套用为多,而大胆尝试这一武器功能的往往是新文论倡导者和当代文学批评家,创造性转化为与本土传统文学相结合的建树并不普遍和显著。

王彬先生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从文本到叙事》,此前的《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以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无边的风月》等,恰恰是我们所期待的有关中国文学的叙事学研究难得的建树型学术成果。

从著作中,首先能感受到一种令人敬佩的理论的雄心。尽管他也举了海明威、巴尔扎克等外国作家的例子,但是重点还是落在了这个层面——中国文本达成世界通解的可能。也就是说,对这些似乎表面上看来是从西方移植过来或者借鉴过来的那种话语和方法,进行中国式的化用与新创,让本土读者发现中国文学有许多新的魅力和尚未照亮的诸多秘境;也引导国外读者恐怕是用最新的理论也能悟出中国文本的堂奥与趣味。

书里出现的这些词:场、时间、空间、叙述者、修辞等等,这些引进的文论概念其实已经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通用起来了,似乎不足为奇。不过,我们发现王彬先生有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论语词,比如内时间、动力元、漫溢话语、亚自由直接话语、叙述集团、滞后叙述、第二叙述者等等,他在外国叙事学基础上产生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又充分地中国化了,事实上面对文本也是非常实用的。《从文本到叙事》里关于“小说中的动力元”那一章,很让人着迷。动力元的概念是在理论上说明小说是靠什么推动的,故事和一种文本样式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以作品来抽样分析、阐释,分为叙事者动力元、人物动力元、语句动力元等层面,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动力元决定小说样式的内在原理。广涉《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以及海明威、巴尔扎克的著作,例子信手拈来,在这个理论里,让你不得不觉得作品中真是存在着那么多的底细。这真是可以作为写作班上的教案的,写得言简意赅,说服力极强。尤其是“语句动力元”那一段,分析孙大圣与二郎神的交手,一般读者对这样的故事也只是看个热闹,王彬先生庖丁解牛般告诉你哪儿是动力元、哪儿是次动力元、哪儿是辅助动力元,彼此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精妙的解读令人豁然开朗,却原来古典名著可能别有洞天。过去我们的文学观念惯于以人文的角度来拒绝科学逻辑,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有些科学性的缜密的分析,对创作是非常有用的,不能盲目排斥某一种思维样式和某一种逻辑模式。我们看传统小说,经常是人物和情节设置被故事的线性阅读所覆盖,快意一时而已,但是王彬先生的研究告诉你,有太多的奥秘有待我们带着关联去破解。探索从文本中生成的实用而不是移栽的中国式叙事学系统,这大概就是王彬的理论雄心。

营构的耐心,是王彬先生的又一可贵的治学精神。他早在10年前就将叙事学理论探索与《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相洽,并有针对性地鲁迅文学院教学中用于开拓学员的思路和创作方法。无论是理论评论班还是创作班,许多学员都得益于王彬先生的叙事学研究心得。由于他是先用文本研究的方式呈现他的理论,因而在理论成熟之前,对于古典名著以及中外文学的精读的学术准备,可想而知,有多么漫长,需要多大的耐性,同时也可以说,他的深趣有多么坚定执著。《红楼梦叙事》这本书,他所用的时间非常长,

叙事学的中国化和实用性

□ 施战军

作为他的重头成果,已经再版过,目前还在认真严谨的持续修订完善之中。而《水浒的酒店》,行文简洁甚至有些轻松,原著中与酒相关所有的细节和各种符码,形成了一个有价值更实用的数据库。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大数据”的说法。它不同于“考据学”和统筹学,而是将过去我们阅读的时候不太留意这些东西——与酒相关的物件、场景、人、时间、相关数量等等,在分类、图表上建了一个活生生的关联网,让我们顿悟:原来我们中国古典名著里面蕴藏了这么多的秘笈,而这些秘笈构成了这部作品成立、完整的重要元素。《水浒的酒店》那么具体又那么新鲜生动,在某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破解古典名著的路径。他的主要理论发现集中于《从文本到叙事》,从中我们看到这么多多年营构,首先体现在学术的储备上,学术储备首先是阅读的储备、博采的储备,看了多少书,研究了多遍才行的,版本也都标得清清楚楚。这番对原典研究所下的气力,令人联想到上世纪以及之前的学人的学术态度。

他营构的耐心还体现在对逻辑的纹理方面的探寻。作品的发生、持续的生长,到在解读中延续的完成,叙事学逻辑上可以提供确凿但又无止境的证明,中国文化、中国文本向来以整体建构为宗,王彬的叙事学不同于趣味奇特的碎片发现,而是具有整体逻辑的烛照,即使某个细微不足的角度也带有全息观照的效应。这种理论上孜孜矻矻点灯熬油的耐心也是罕见的。

第三方面,学术的初心,这是王彬先生格外突出的品质。对于学术本身,他始终保持着敬畏,秉持细查明辨盘根究底的率真之心。他特别注意学术的价值,学术不是呆滞的,是活润的,但又肯定应该是对的,不会是死的和错的。他专注于文学新意生成的可能,从他的著作中,我们看得出“接着说”和“从头另说”的努力,但那决不是“重复说”和“胡乱说”。过去的诸多名著,前人对于文本的意义解析和由来探勘仿佛已经完全说满了,但他的这个理论,可以看出另外的意义和根由。以童真的初心和雄厚的功底,在文本内部探险,使他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进入了一个学术的自由世界。这几本书便是他学术上持有初心的明证。

王彬先生的治学给我们很多启示。简而言之,第一个启示是在理论自觉和创造模式方面的。习惯上我们在评说文本时注重自己的感觉,尽管是个性化的表达,但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作家作品的附着物而已;再就是容易用现成的理论,使作品成为某种理论的说明材料。这两种倾向构成了较为省心省力的文学批评的两种方法。其实,感悟性的批评必须得有史识的支撑和理论的自觉,看李健吾的文章,在随意潇洒的文字后面,却有由古今中外的涉猎和思考中析出的理论坐标。王彬的理论自觉和创造模式,在于不轻信现成理论也不依靠感觉任性,在此之上,韧劲儿一以贯之,在厚实的学养基础上保持着创造的主动性,认准一种理论系统,在与文本的交互中不断显出意义、呈现价值,多年做下来,发现意义和价值果真一重重地实现了。

文本根基这四个字,是做学问的王彬先生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这本书的书名是《从文本到叙事》,也道出了王彬先生的治学方法。他所有叙事学的理论的来源和指向,都是文本。理论架构的显现路径是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因而更加可用、可信、可靠。我们看到的不少评论文章,常有故作高深之态,或者故作惊人之语,激情之下往往暴露出学养的不足和阅读的不精,往往是知道的太少所以大爱多言,而我们看《从文本到叙事》每一章节都很短,他知道的太多了,可是说出来的很少,只说了必须说的精粹可珍的那部分。由此,《从文本到叙事》《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与《无边的风月》等著作,也应该是文学批评和中国化的叙事学理论值得研究的文本。

解玺璋《张恨水传》新书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冕) 8月4日,“民国的张恨水和张恨水的民国——解玺璋《张恨水传》新书分享会”在首都图书馆举行。孙郁、徐迅、谢家顺等专家学者和本书作者与会,分享了关于这部新作的感悟思考。

解玺璋近年来致力于人物传记写作,尤对近现代人物多有心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恨水传》全方位再现了作家张恨水的一生,同时生动刻画了传主的情感经历及其在新旧文化夹缝中、新旧时代更迭中权衡折冲的心路历程。与会者认为,报人身份的张恨水在写作中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作者解玺璋与传主一样有着报人的经历。《张恨水传》不仅描述了传主曲折的人生轨迹,而且从普通读者的鲜活视角出发,还原了其生活年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同时,作品吸纳了学术界对张恨水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纠正了人们过往对张恨水的一些误解,力求从不同侧面把一个至真至诚的张恨水呈现在读者面前。

谈及该书的创作感受,解玺璋坦言,张恨水笔下的民国,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人情味的世俗社会,有其独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张恨水笔下的北京,既有千年古都敦厚宽容、平和幽默的文化底蕴,又将新文化融入萧散悠远的古都韵致之中,营造出一种兼容并蓄的人文气息,以及俗中见雅、雅不避俗的审美趣味和情致。他千余万字的小说、散文、小品,为读者保存了昔日北京鲜活生动的形象,这为人们重新认识旧时代,重新认识张恨水创造了机会、提供了条件。

《大海截句集》首发

本报讯 8月5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诗人与大海——邀你来赴一场大海与诗的约会”主题文化沙龙在京举行。何向阳、蒋一谈、伊沙、车前子、周瑟瑟、崔曼莉、安琪、杨庆祥、戴潍娜、严彬、唐朝晖、冬子等20余位诗人参加,围绕诗选《大海截句集》展开讨论,并朗诵其中的诗作。

《大海截句集》由蒋一谈主编,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选录了50位诗人描写大

海的50首截句。书中的每一首截句都配有诗人的手写稿。诗人们将大海作为抒情对象,在短小篇幅中抒发了对大海的独特情感以及对生命的复杂感悟。

大家在交流中谈到,截句虽然只有三四行的篇幅,但要写好不易,需要诗人对时代、社会有深入、全面的把握,好的截句是宏大时代背景和诗人瞬间灵感的巧妙结合。

(黄尚恩)

桓仁版画作品晋京展出

本报讯(记者 王冕) 8月4日至9日,由辽宁省美协、中共本溪市委宣传部、桓仁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的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耕云种月·庆祝改革开放40年桓仁版画作品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150幅版画作品,汇集了桓仁版画艺术爱好者近年来创作的部分佳作,代表了桓仁版画创作的整体水平。

桓仁版画大多取材于民间风俗、地域文化、山水风光、历史传说、生产劳动等传统题材。陈东明、任凤山、于东风、崔哲海等一大批版画作者以富有乡土气息的质朴绘画语言和表达方式,通过版画艺术呈现出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

不懈追求,抒发了感悟岁月的美好情怀。这些作品构图饱满、手法朴拙,涉猎广泛、刀法娴熟,线条粗犷、用色大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桓仁位于辽宁东部山区。桓仁版画走过了百余年历史,随着时代发展逐渐从当地人民的生存所需转变成艺术追求。从2006年开始,桓仁确立了“文化名县”发展战略,将版画创作列为重点扶持项目。2011年,县政府设立版画创作专项经费,并在当地为版画作者建立了本溪版画院作为免费创作基地,推动创作队伍不断扩大。近年来,桓仁版画作品数次在国内外展出,引起广泛关注。

夏荆山艺术展亮相国博

本报讯(记者 王冕) 7月30日至8月1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夏荆山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了今年95岁高龄的夏荆山创作的书法和绘画作品77幅,全面展示了其艺术生涯和创作成就。

夏荆山1923年出生于山东潍坊,16岁即师从画家郭味蕻研习丹青,擅作花卉、人物与山水,佛像绘画尤显个人特色。上世纪70年代他移居美国后,30多年间笃志内学、兼修外艺,先后游历数十个国家,参观访问世界著名博物馆学习临摹,博采众长,并与自身积累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相汇融,使其作品既传承宋元道释人物绘画工整细致的风格,又在此基础上探索创新,以遒劲的线条、独特的造型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和清丽脱俗的艺术境界。80年代中后期起,夏荆山多次回国,直接参与修复古寺、学堂等文物建筑的活动。1994年,他在北京密云创办了“荆山画院”,义务提供艺术教育和创作平台,迄今已培养了上千名学员,用实际行动回报中华文化 and 人文精神的深厚滋养。

主办方表示,夏荆山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把毕生创作的书画艺术,无私地推向全世界,让世人可以沉浸于中华文化精粹之美”。此次展览就是对他的高度肯定和充分褒扬。

钱小惠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协原专职作家钱小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钱小惠,中共党员。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突破》,散文集《死车的复活》《生活之路》,长篇纪实文学《山花烂漫》《岁月如歌》等。

汪衍振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作协原主席汪衍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22日在黑龙江逝世,享年56岁。

汪衍振,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1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法战争》《大清皇商盛宣怀》《一代名臣曾国藩》《风云福顺泰》等。